

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

罗伯特·杜諾万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

罗伯特·杜諾万著

馬立浩摘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Robert J. Donovan
EISENHOWER
THE INSIDE STORY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6
根据紐約哈泼兄弟出版社1956年版摘譯

• 內 部 讀 物 •
艾森豪威爾內幕故事
〔美〕羅伯特·杜諾萬著
馬 立 浩 摘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四)0.42元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5 · 字数101,000
1959年12月第一版 1964年5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363

譯者說明

本书主要叙述艾森豪威尔在他第一任美国总统(1953—1956)期間对国内外一些重大政策的考慮，以及这些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原书是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第二任总统而出版的，因此許多地方都是有意識地替共和党和艾森豪威尔的国内外政策辯解和吹噓。不过，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由于参阅了一些未发表过的档案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国統治集團欺騙國內人民和策划对外侵略的各种阴谋，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在美国一些重大政策形成过程中表現出来的錯綜复杂的矛盾。这个中譯本主要选譯有关对外政策，特別是远东政策的部分，以供我国研究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士参考。中譯本因刪节关系，章节已有变动，有些标题是譯者加的。

Shanghai
1958

目 录

一	朝鮮之行	1
二	放蔣介石出籠	5
三	關於斯大林逝世	8
四	雅爾塔協定	11
五	削減軍事撥款	15
六	白宮和內閣的辦公制度	19
七	向蘇聯“呼呼和平”	26
八	朝鮮停戰	31
九	艾森豪威爾和中國	48
一〇	共同安全問題	56
一一	關於蘇聯擁有氫彈的聲明	61
一二	和平利用原子能	62
一三	1953—54年的經濟蕭條	73
一四	1954年國情咨文中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問題	88
一五	限制總統簽訂條約權的布里克修正案	90
一六	印度支那的戰爭	102
一七	尼克松在政府中的地位	112
一八	台灣問題	117
一九	“新面貌”的後幾個階段	128
二〇	日內瓦四國首腦會議和開放天空計劃	136
二一	削減預算	144
二二	作出再度競選決定的冬季	147

一 朝鮮之行

艾森豪威尔于10月24日在底特律所發表的競选演說中曾說道：

“新政府从何开始呢？从總統下一个簡單果断的决心开始。决心就是：避开政治見解的分歧而集中精力在結束朝鮮戰爭这一任务上，一直等到該項任务光荣地完成时为止。

“該項任务需要我親自到朝鮮去走一趟。我將首途赴朝。只有这样我才会知道怎样尽力为美國人民的和平事業服务。我將去朝鮮。”

在他會見杜魯門之后十一天，他从長島的密契爾機場起飛，去巡視冰天雪地的朝鮮戰場。

此行在某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艾森豪威尔目睹美國戰地士兵生活困苦，美國的力量在前途茫茫、拖延不決的戰爭中消耗殆盡。因此加強了他对于不管怎样必須取得解决的决心。此外，他同他的顧問們在返國途中在“海倫娜”號巡洋艦上和在檀香山关于战略的商談，形成了新政府日后的軍事政策的思想基礎。

这位当了选的总统在这些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是：怎样解答他所謂的“偉大的方程式”，就是說如何永远維持一支强大的軍事力量而同时在这样做时又不使國家破產。杜勒斯和当时担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兩人提供了意見，这些意見成为艾森豪威尔正在構成过程

中的战略觀念的一部分。

赴朝途中，同艾森豪威尔一行人在硫磺島會合的雷德福，覺得美國在亞洲只採取了雜亂的不協調的守勢，而並沒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長期、全面的战略計劃。

他認為美國的軍事力量分布太廣；尤其在亞洲，把太多的軍隊駐扎在足以受共產黨牽制的地点。雷德福不主張这样分散的部署方式，而贊成把美國的力量集中在北美洲或北美洲附近，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后备力量。經過这样的布置，前線的防務將主要由非共產黨國家正在建立的當地軍隊來負擔；萬一發生戰爭，美國的机动力量可以靜待機會向敵人的要害出擊。

具有同一見解的杜勒斯，竭力推銷他兩年多來一直在鼓吹的主張，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進攻力量，用來威懾共產黨，使他們不敢從事戰爭。他的理由是，美國不太可能沿着共產黨這麼大的整個地區，在四周都駐上充分和固定的防禦力量，雖然他們也許會從這些地區出擊。他說，美國應該用維持一支足以迅速地能向侵略大本營還擊的巨大報復力量的方法來集中力量嚇退進攻，而不要把防禦力量到處分散。所討論的這一點就是“大規模報復”政策的先聲。

雷德福和查爾斯·威爾遜兩人都覺得將來亞洲在冷戰中是一個重點。艾森豪威爾一方面承認亞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說，西方不能解決它在亞洲所面臨着的許多問題，除非等到歐洲強盛之後才有可能。他的論點是，一旦西歐擁有了維持和保衛它自己的力量，并能使全世界感到它的威力時，亞洲問題就達到了可以解決的地步。

朝鮮之行對最後選中雷德福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位當了選的總統在部隊里時已經認

識雷德福，可是威尔遜却從來沒有遇見過他。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國防部長推舉一位接替陸軍上將奧瑪·布萊德雷的職務的人，因為後者已經當了兩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的任期將在下一年8月屆滿。艾森豪威尔覺得新任主席應該由一位贊成在亞洲實施遠大的戰略這個觀點的軍官來擔任，從這一點上來說，雷德福當然是這樣一個人。關於這件事，還有一點是當了選的總統必須考慮的，就是多年來，共和黨一直在指責說：羅斯福政府和杜魯門政府太偏重歐洲而很少注意亞洲。艾森豪威尔正在尋覓一位適當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的經歷一定要表示出他對遠東抱有濃厚的興趣。在雷德福的資歷里，這一點比任何東西都來得突出。最後，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遜都對雷德福在朝鮮之行中的表現大為贊賞。

舉新總統的一句話來說明他對雷德福的重視，這句話是他在4月10日（差不多在雷德福被提名為主席之前一個月）的內閣會議上講的。總統注意到華盛頓州長阿瑟·蘭格拉在談起關於西雅圖的沙點海軍根據地應該不應該撤銷這個爭執時，曾引用雷德福說過的一句話，說這種舉動將是愚蠢的。艾森豪威尔加上一句說，他相信雷德福的判斷比其他許多人的判斷更為可靠。

在“海倫娜”號巡洋艦上時，艾森豪威尔獲悉，12月5日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全國製造商協會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宣稱：他對朝鮮衝突有“一個明確具體的解決辦法”，而且這個辦法不會“增加挑起全球衝突的危險”。麥克阿瑟不願公開說他的計劃是什麼，但是願意向艾森豪威尔透露，如果總統對此有興趣的話。當時，在“海倫娜”號上，艾森豪威尔的顧問中有幾個人不太相信這句話，他們懷疑當了選的總統在這個關頭同麥克阿瑟牽連在一起是否

明智。

艾森豪威尔問道，“为什么不？”他說，麥克阿瑟畢竟是一個偉大的軍人，他和这位前任远东司令虽然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意見，但是他覺得同麥克阿瑟商談并沒有什么坏处。

这一点决定了，可是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批人中有几个人仍旧覺得拍給麥克阿瑟的任何电报應該保守秘密，但是当了选的总统对此又表示反对。他問道，为什么不應該听听麥克阿瑟的建議呢？他以習慣的口吻說道，不論誰有任何好的意見，他都願意傾聽。他拍了一个無綫电报給麥克阿瑟，其中有一段說：

“多謝你公开表示願意同我討論这些問題，并向你肯定地表示我期待着同你作非正式的晤談；我和我的同僚們可以因此而得悉你的全部意見和經驗。”

12月9日艾森豪威尔的新聞秘書詹姆斯·哈格蒂公布了这封电报和回电；麥克阿瑟在电报中表示謝忱，并說：

“我特別感謝你，因为虽然由于我个人在职务上同这件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自从我回國以來，官方对我的意見所表示的兴趣，即使是極輕微的兴趣，这也还是第一次。”

報紙刊登了这两个往返电报后，讀者中有一位勃然大怒起來，他就是杜魯門总统。他在参加他岳母葬礼之后，正从密苏里的独立城回到華盛頓去，火車到达西弗吉尼亞时，晨报已經放在他車廂里了。他叫他的新聞秘書洛哲·德貝發表声明說，如果麥克阿瑟真的有一个結束战争而不会引起更大規模的战争的計劃，他應該立即提呈給有关当局——意即总统。第二天在他的記者招待会上，杜魯門仍然心里冒火，对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大肆攻击。他說，他怀疑麥克

阿瑟怀有行得通的結束战争的計劃。杜魯門宣称：至于艾森豪威尔，他的朝鲜之行不过是实行競选諾言的一种迷惑人心的举动罢了。这句话使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

当了选的总统回到紐約之后，即同麥克阿瑟会見，但是并没有公布麥克阿瑟計劃的詳細內容。

二 放蔣介石出籠

同撤銷工資和物价管制的声明同时發出的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國情咨文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他公布了有关駐在台灣海峽的美國第七艦隊所負任务的政策。他說：

“1950年6月，緊接着对大韓民國的侵略性襲击，美國第七艦隊受命防止对台灣的攻击，并保証台灣不被利用为進攻中國共產党大陸的基地。

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求把美國海軍当作为防衛共產黨中國的一只手臂。自从那个命令發布那天起，中國共產党不顾1950年当时的情况、侵入朝鲜并襲击該处的聯合國軍。他們一直拒絕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出的停战建議。最近他們联合苏联，拒絕印度政府在聯合國提出的停战建議。美國和其他53个国家都已經接受了这个建議。

因此，在这样情況下去要求美國海軍為中國共產党担负防衛的責任，从而允許他們更泰然地去殺戮我們在朝鲜的士兵和我們的聯合國同盟軍，是不再合乎邏輯，或者說是失去了意义的事。

所以我現在指示第七艦隊不再掩护共產黨中國。請允許我把話說得非常清楚：这个命令在我們一方面并不含有侵略的意圖。但是肯定地我們沒有保衛一个同我們在朝鲜

作战的國家的义务。”

參謀長聯席會議發布了這項命令，命令如下（有關其他指示的機密的引言部分略去）：

緊急作戰

發往：珍珠港太平洋總司令轉

收文：日本東京遠東總司令

現行緊急指令中關於保證台灣和澎湖列島不被用作中國國民黨向中國大陸作戰的基地的那部分現在予以撤銷。1953年2月2日

杜勒斯根據他同艾森豪威爾共同作出的決定，在總統就職前在華盛頓起草了國情咨文。他們兩人很少，或者說沒有向軍事顧問們請教就這樣做了，因為他們認為這主要是一件政治事務。可是總統在1月30日還是向內閣提了出來；在他讀了這一段之後，威爾遜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久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迴響。他問，這個命令是否含有任何足以影響美國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的用意在內？總統回答說，目前這個要採取的行動一點也不含有這種用意。他向內閣保證：這個聲明字面上說什麼就是什麼，沒有其他用意在內。艾森豪威爾補充說，它當然也不包含在美國方面有任何侵略的企圖。

在國情咨文的最後定稿中，這個聲明很簡單地說，“這個命令在我們一方面並不含有侵略的意圖。”在他向國會遞交咨文之前兩天，有關他對第七艦隊所採取的決定的消息通過國會方面的來源已經給報界獲悉，因此當總統赴國會大廈時，各方面對這聲明的含意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懷疑。總統在向國會宣讀這個咨文時，到了最後一分鐘他還改動了這句話，企圖重新強調它並不包含侵略的意思，改動後的那

一句說，“請允許我把話說得非常清楚，這個命令在我們一方面並不含有侵略的意圖。”

可是，對有些人來講，它似乎並不非常清楚。在咨文遞送後的第二天，安东尼·艾登向下議院說，倫敦已向美國提出抗議，警告它這一個行動也許會“遭到十分不幸的反應，而無補于軍事優勢”。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說，這個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懼病”。

這個命令，就像它原來的企圖一樣，產生了心理上的而不是直接軍事上的影響。當共產黨中國在1950年加入朝鮮戰爭以後，事實上第七艦隊差不多立刻撤除了它對共產黨的海岸的“掩護”。從那時起，中國國民黨在不受這個艦隊的限制之下，一直不時地騷擾大陸。真的，五角大樓從未否認某些報導說：美國海軍曾協助國民黨同大陸上的游击队保持聯繫。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新命令僅僅使已經存在着近兩年的情況合法化罷了；說美國海軍實際上一直成為保衛紅色中國的一只手臂，這句話是把事情說得比較嚴重就是了。

無論是艾森豪威爾或是杜勒斯，都並未料到或者希望這個命令會導使蔣介石進犯大陸。但是，總統和國務卿曾決定：必須結束在朝鮮的僵局，而對第七艦隊所發布的命令的背後含意，是要警告中國共產黨：如果他們不同意朝鮮停戰，美國也許還要利用台灣作為同他們作戰的基地。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十分強烈地感覺到：如果中國共產黨清醒過來，認清僵持的結果不外乎引起美國在另外兩條或三條戰線上對他們作強有力的進攻的話，他們就會在朝鮮戰場上屈服的。另外一個目的是迫使共產黨不得不沿着台灣對面的海岸線駐扎軍隊，否則這些軍隊也許早已被使用在朝鮮

戰場上了。

從軍事方面來講，這項命令是幾種可以對中國共產黨施加新的壓力的辦法中危險性最小的一種；從政治方面來講，這項命令使新政府在同情它的人面前顯顯顏色，表示它在同共產黨較量中是胸有成竹的。有人說，這是“放蔣介石出籠”。說這話的人更多的是出于希望，而不是出于對局勢的了解。“出籠”一詞並非總統所用的名詞。

甚至到現在，在政府中關於這項命令的價值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仍舊認為它在心理上有些愚蠢，害多利少。還有些人，特別是杜勒斯周圍的人，認為它對中國共產黨起了一個嚴重的影響，影響的程度遠遠超過在美國國內所覺察到的情況；並且認為共產黨是很認真地對這項命令的用意加以考慮的。它說明了如果朝鮮僵局繼續下去，美國將決心擴大對中國的戰爭。

三、關於斯大林逝世

3月2日，總統從奧古斯大回來後的第二天，他接見了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長費薩爾·沙特王子。他答應王子他將努力糾正美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惡化”。第二天，3月3日晚上，艾森豪威爾已經就寢，殊不知在克里姆林宮里正發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午夜一時半，總統助理羅伯特·卡特勒的H街的寓所里電話鈴在響着。鈴聲使他從熟睡中醒來，他聽到電話里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聲音。

“你聽見那個消息沒有？”杜勒斯問道。

“什麼消息？”卡特勒問。

杜勒斯回答說，斯大林中了風，據說快要死了。

杜勒斯由於他的職務關係，隨便什麼時候，不分晝夜，他都能直接見到總統。杜勒斯問：如果他進入總統臥室里去告訴他這個消息，卡特勒認為如何？卡特勒不贊成這樣做，並且建議在早晨七點鐘乘總統沒有到辦公室之前在那裡碰頭。國務卿的弟弟艾倫·杜勒斯表示同意。電話挂斷之後，卡特勒興奮過度，再也睡不着了。三點鐘時他同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心理戰略的首席顧問杰克遜通了一個電話，告訴他這個消息和想一清早同他會面的打算。四點鐘時，卡特勒打電話給哈格蒂。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哈格蒂睜眼惺忪地回答說，“已經有三個人來過電話了。”

卡特勒問哈格蒂願不願意在七點鐘到總統辦公室去，杰克遜、杜勒斯和他都將到那裡去。

“先在我的辦公室里見面吧！”哈格蒂說，因為他覺得在未見到總統之前，他們幾個人應該湊出一些意見供總統考慮。

卡特勒表示同意；他就開始起草將來總統要發表的聲明，一共只有幾句話，其中一句說，萬能的上帝眷顧世界各國的人民。

當這批人在白宮西廂的哈格蒂辦公室里聚集後，卡特勒打了一個電話給白宮大樓的傳達室，詢問總統是否起床。

“總統還沒有醒哩。”傳達員回答說。

總統醒來後獲得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那是一個陰涼的早晨；七點四十分，總統安然地漫步走進他的辦公室，穿着一件紅褐色馬球上衣，頭戴一頂咖啡色的帽子，帽邊拉得低低的，遮住了他的前額。

“好吧，”他帶着嚴厲的口吻說，“你們想对于这件事我們該做些什么？”他眼睛釘着卡特勒、杜勒斯、哈格蒂和杰克遜，他們四人这时已經从新聞秘書办公室來到了这里。

他們就此討論开了，討論進行了近兩小時。“幸福”雜志的發行人杰克遜是請假來这里的，他迈动兩只長腿在總統的办公室里走來走去，不时地提出这个或那个主意。總統的談話稿經口授后，修改了又修改。那天上午，這一批人照預定計劃又开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常会。在这个會議還沒有結束以前，總統的談話已發布給報界。它說：

“在歷史上的這一個時刻，當俄國人民大眾都因為蘇聯統治者患病而感到十分焦慮的時候，美國人民想念着所有蘇聯的人民——男子和婦女、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他們祖國的鄉村、城市、農庄與工場的所有蘇聯人民。

“他們和全世界各國人民都同是一個上帝的孩子。並且像其他各國人民一樣，俄國千百萬人民和我們一樣地渴望着友好與和平的世界。

“不管掌握政府的是些什么人，我們美國人的禱文總歸是，願上帝眷顧這個遼闊的國家的人民，并在他智慧的主宰下，使他們有機會在一切男、女與兒童都和平友愛的世界中生活。”

這項談話實際上是一個向俄國的新領袖，不管他們是誰，發出的維持和平的呼呼。

3月5日晚上，當哈格蒂打電話給艾森豪威尔告訴他莫斯科電台最近的公告的時候，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夫人正在進餐。公告說：

“列寧的战友和列寧事業的天才的繼承者、共產党和蘇聯人民英明的領袖和導師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

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哈格蒂提議總統向克里姆林宮發出一份官方的唁電；總統在電報里划去了表示稱頌和同情的字句，唁電說：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向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聯盟政府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大元帥的逝世表示哀悼。”

總統像任何其他人一樣，只能抱着好奇和等待的心情，看俄國現在可能發生些什麼變化。他和他的顧問們作機密談話中，並不馬上作出任何結論，但表示在俄國和西方之間的關係上希望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3月6日，內閣會議對這個獨裁者的逝世作了一個簡短的討論。洛奇報告說，駐聯合國的蘇聯官員似乎很緊張。他敦促美國應採取鄭重的態度。總統說，1946年以來，國務院和心理戰略委員會的官員們一直在猜測蘇聯政府換人後會發生些什麼樣的變化。他抱怨說，但是現在這件事已經成為事實，可是他找不到任何預先訂就的計劃或已經完成了的研究來使政府得以隨時應付局面。他批評說，缺少這種計劃再一次說明這種像當時杰克遜和卡特勒正在進行的工作的必要性。

四 雅爾塔協定

在這幾個月里，總統遭遇到另外一種牽涉到共產主義的心理問題，——關於所謂奴役問題的決議。

前一年夏天，共和黨在芝加哥年會上，急欲在政治上利用國內對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所表示的經久不釋的反感。因此，他們關於外交政策的綱領中（杜勒斯是這個綱領主要

的起草人)有这样一段声明：

“在共和党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否認包含在秘密諒解中的一切應負的義務，諸如幫助共產黨進行奴役的雅爾塔協定。共和黨得到最高當局總統和國會的許可，要說清楚：美國的政策，作為它和平目標之一，十分乐意看到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得到真正的獨立。”

在這個運動中，有些共和黨發言人表現得那樣熱烈，因此他們指望衛星國家的人民能得到解放。杜勒斯在就任國務卿后的第一次演講中，對被奴役的人民說，“你們可以把我們算上。”但是他說得很清楚，腦子里所想的途徑只是通過和平的措施。解放這個概念，由於它不可避免地印上了美國軍事冒險的形影，在新政府的政策中從未贏得立足點。總統在他的國情咨文中強調“和平方法和手段”說：

“我們決不為了取得本身的幻想利益而默認任何人民被別人奴役。我日後將請求國會聯合作出一個適當的決議，說明白這個政府不承認包含在同外國政府達成的秘密諒解中的任何應負的義務，這種義務使這種奴役成為可能。”

他這幾句話受到了共和黨人的贊揚，其中有幾個似乎馬上得出結論說，艾森豪威爾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將是否認雅爾塔協定，這一切將意味着對弗蘭克林·羅斯福的一種譴責。但是這班人是會大失所望的。

總統同杜勒斯仔細研究了措詞之後，在2月20日向國會遞送一個決議案，建議國會和總統一同拒絕對秘密諒解的“任何解釋或應用”，這些解釋或應用“已經被曲解濫用來實行對自由人民的鎮壓”。決議案對“那些已經屈服於蘇聯專制統治淫威之下的人民將在足以維持和平的體制之內，重新獲得自決權利”提供了希望。